

日伪时期江苏县镇“维持会”研究

潘 敏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日伪时期江苏 22 个维持会的研究发现:维持会中的上层人物基本上是地方上的头面人物,或者说是有势力、有影响力之人,但他们进入维持会动机复杂。正因为动机复杂,才使维持会中的中国人与日本人矛盾迭起。中国人显然的弱势地位迫使一些人只能采取退避的方式消极抵抗。一些地方的维持会几经易人,维持秩序的职能却越来越弱,甚至成为社会的乱源。

关键词 沦陷区 维持会

维持会^① 又名“治安维持会”,它是在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政府机关及官员撤离后,伪政权尚未正式建立之前,由各地头面人物出面组织的维持地方秩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供应日本人军需的准政权组织。^② 关于这一课题,由于种种原因,大陆史学界几乎无人涉足。笔者仅见台湾学者罗久蓉对 1941 年的郑州维持会做过个案分析。另外,美国历史学家萧邦奇在研究

① 有少数地区在日军占领后维持秩序的准政权组织称为某某县自治委员会或称复兴委员会,也是本文考察的对象。

② 罗久蓉这样定义维持会的:维持会是日本人占领一地之后,为进一步控制地方,利用地方势力所组织的一个过度性组织。罗久蓉:《历史情境与抗战时期“汉奸”的形成——以 1941 年郑州维持会为主要案例的探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4 期下册,1995 年 6 月。

1938——1940 的杭州著作中也详细描述了该市维持会的状况。^①至于维持会的人员构成、运作以及与日本人的关系如何?它与战前的国民党政权有多少瓜葛?我们几乎说不清。笔者试图通过对江苏 20 来个县镇维持会的分析来探讨上述诸问题。

江苏各地维持会存在的时间长短不一。大体言之,日本人统治较稳定的地区诸如苏南等地,维持会持续的时间较短。1938 年 2 月,日本东京“天皇”御前会议之后,苏南各地维持会更换名称为“自治会”。1938 年 3 月,“维新政府”成立,着手组建县公署,各县镇维持会几乎全套人马进入县公署。这与美国学者萧邦奇描述的杭州市维持会有差异:“维新政府”成立后,杭州市维持会职员逐渐被政府官吏排挤出政权机构。^②这种差异的部分原因可能是伪中央政权无更多的人员向县一级政权渗透。而在苏中尤其是苏北地区,日军与抗日武装拉锯的地方,维持会断断续续存在很长时间。

一 各县镇维持会的成立及其人员构成

1937 年日军占领上海后,向江浙腹地迅速推进。日军的入侵给这一地区带来极大的混乱,表现为占领前的狂轰乱炸和占领后的乱杀无辜、强暴妇女。与此同时,国民党政权机关以及政府官员在日军到来之前业已撤离城镇,部分国民党军警系统亦化整为零,退避乡村。政治上的真空导致大小城镇处于无政府状态,地方上的宵小流氓乘机四出劫掠。罗久蓉在论述郑州维持会时指出,这

① R. Keith Schoppa, *The Changing Face of Collaboration: Hangzhou, 1938—1940*, 提交 1998 年举行于华盛顿(D. C.)之美国亚洲学会论文。

② 同上。

股来自内部的乱源给商家带来的困扰并不亚于日军的强势欺压。^① 他的论述同样适应于江苏各地。

如六合沦陷后出现了这样一副惨景:“城内阒然无人,政府官吏早经出走,一般民众亦避居乡间,所遗者仅少数老弱余,则一般无赖游民在城乘机掳掠,甚且纵火焚烧,商市精华被焚大半,全城居民无一幸免,地方混乱以达极点。”^② 常州更是惨不忍睹:该市在未沦陷之前,业已遭受日机四次的大轰炸,城内大火四起,因居民早已逃避乡间,无人扑火,火势蔓延,连烧四昼夜。“于是一般趁火打劫的北乡农民,便持了土枪,任意抢劫……”,到守军撤退之后,“城内更形混乱,焚烧杀掠,尸体纵横,城内景象,不堪入目”。^③ 沦陷后的苏州,“城内外‘奸淫掳掠’,到处有精彩的表现。全苏州的商店住宅差不多全遭到空前的大洗劫,翻箱倒篋狼藉,钱财衣物搜括一空……”^④ 沦陷后的城镇一般景状是:居民大部分逃离,大火蔓延,囚犯越狱,土匪逞凶,地痞无赖趁乱打劫。这当然不是日本人需要的城镇。他们迫切需要有秩序的社会,以便于其统治,进而汲取各种社会资源。但面对这一批批群龙无首、浑水摸鱼的游民无赖,他们束手无策,可又苦于人手短缺,不可能亲自建立一个有效的控制系统,只能组建一个以中国地方上的头面人物为主的组织,通过该组织恢复地方秩序并提供军需品及日常用品。

① 罗久蓉:《历史情境与抗战时期‘汉奸’的形成——以 1941 年郑州维持会为主要案例的探讨》。

② 《维新政府内政部呈六合维持会会长被杀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卷号 2101~307。

③ 东人:《劫后的常州》,载《沦陷后各地的纪实》,怒吼出版社 1938 年 2 月,载贺圣遂等编选抗战实录之二(上)《沦陷痛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④ 苏民:《天堂变地狱——沦陷后的苏州》,选自《战时通讯》第 1 辑。载贺圣遂等编选抗战实录之二(上)《沦陷痛史》。

日本人占领某个城镇之后,便多方物色该地有影响的人物出面组建维持会。如日军驻扎六合时,“访谘父老,物色公正士绅,出维秩序”,对不愿与其“合作”的谢鹤龄(国民党退休官员)甚至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式“劝说”。于是由谢鹤龄、郑自牧、王寿春为首的、包括几名办事人员在内的六合维持会宣告成立^①;日军初在无锡,竟用绑票的方式,把有名绅士召集在一起组织维持会。^②在扬州,日军将躲在家里夹墙中的方小亭(原为律师)抓去“出任”“江北自治委员会委员长”^③;在镇江,柳肇庆也是在日本人的“敦促”下出任自治会会长的^④;日军到达丹阳后,到处找县商会会长郭颂如,当在延陵镇找到他时,“百般威胁”,要他出任维持会会长,郭无奈,“勉允其请”。^⑤当然并非所有的地方都如六合和无锡那样令日本人如此费神。海门维持会的组建就省事的多。日本人占领该县镇后,由带路人沈葆廉(曾留学日本)、袁磋方领头,联合本县大地主沈幼瑜迅速成立了维持会。

实际上大多数维持会的组建更类似于海门县,即在日本人的倡导和本地人的主动参与之下共同完成的。在我接触的史料中,经常见到诸如此类的骂语:某某汉奸勾结日本鬼子组织维持会;也有一些不带感情色彩的叙述:某地维持会已成立,由某某人主持。中国人的配合与支持(当然也有投机分子,假日本人之手以提高自

① 《维新政府内政部呈六合维持会会长被杀案》。

② 锡民:《劫后无锡惨象》,选自《战时通讯》第1辑。载贺圣遂等编选抗战实录之二(上)《沦陷痛史》。

③ 吴廷阶:《伪八团始末》,《镇江文史资料》,第9辑,1985年。

④ “江苏省镇江、高邮、无锡、常熟县各级官员贪污渎职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号二00三(4)~523。

⑤ 《劫后丹阳之形形色色》,《苏讯》第1期,1939年9月1日。

己地位)。说明维持会的成立,不仅仅是日本人单方面的需求,同时也迎合了城镇居民尤其是有产阶层的心理。就沦陷区一般城镇居民而言,他们不可能与政府官员一起撤走,日子还得过下去,即使是忍辱负重。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相对稳定有序的社会是人们所渴望的,以免无时无刻生活在恐惧之中。以镇江为例,该市沦陷一月之久仍未成立维持会,地方不安定,人心仍恐慌,迄至柳衍斋出面担任维持会会长,镇江市居民“觉得到这时候,才算地方有主,群情稍觉安慰”。^①对稍具财产者或小资本家来说,他们希望迅速从混乱中摆脱出来避免财产的进一步流失;再者,只有社会稳定有序经济运转才具可行性。正是基于这种渴求秩序和稳定的心理,使其中一些人“情愿”背汉奸骂名甚至冒生命危险与日本人“合作”。下文笔者将根据收集到的 22 个维持会会长材料(见表)来分析与日本人“合作”主要集中在社会的哪个层面。

在一般人的观念中,进入维持会与日本人“合作”的似乎是那些丧失民族气节的无耻小人,他们处世待人毫无原则,属地方上混混、地痞流氓之类的人物。这种想当然的认识如果指维持会里的下层成员还比较恰当。罗久蓉在论述郑州维持会时指出,维持会中的下层成员中不乏地方上的地痞流氓,日军进城时他们打着旗子欢迎日本人,而日军每占领一地,首先要找的也是他们。^②江苏各地维持会中,地痞无赖混迹其中也比比皆是。一般而言,这些下层人员只是做一些“跑腿”之类的事,并不是维持会里的关键人物。

至于维持会中的上层人物的出身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形,从后

① 佚名:《镇江沦陷记》,选自《镇江沦陷记》(个人刊 1938 年 8 月),载贺圣遂等编选抗战实录之二(上)《沦陷痛史》。

② 罗久蓉:《历史情境与抗战时期“汉奸”的形成——以 1941 年郑州维持会为主要案例的探讨》。

面江苏部分县镇维持会会长简历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出长维持会的基本是地方上的头面人物:留学生、商人、前国民党官员、青帮头头等等。除一人家境贫穷外(实际上其人只是傀儡的傀儡,在维持会里有名无实^①),其余则为本地的富豪之家。其实也只有这些人才具有与日本人打交道的资格。

22个维持会会长中,具有商人或小资本家身份的7人,占31.8%,其中4人曾经在或现正在商会任职。除了上述提到的商人比其他任何社会集团更希望社会稳定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即商会是这些地方上最具组织性的团体。在国家政权较为有力控制之时,商会也许发挥不了地方上的领导作用,一旦出现政治真空,他们最有可能填补这一真空。实际上在很多地方,商会的大多数人员整体加入维持会;再者,日本人也愿意利用地方上的现组织,巩固其势力。此外,国民党政府官员亦有意让商会人员与日本人周旋。例如在日军侵入盐城之前,盐城县政府国民党官员即向商会主席暗示:商会是地方上人民团体,商会会员不是国家委派的人员,“无守土之责,应当自筹维持会地方”,并把县政府的一些物资交给商会保管,放手让商会处理与日军之间的关系。^②

国民政府官员所占比例也达22.8%,他们与日本人“合作”有下列两个原因:他们具有公务员的经历,是日本人拉拢的对象;有些人在国民政府官场上不得志,试图借机一展个人“抱负”或者乘机捞一把;当然也有一些政府官员(尤其是退休官员)是基于沦陷区糟糕的秩序的忧虑。年已七旬的六合县维持会会长谢鹤龄的复出就是一例。

① 杨化民:《日伪时期丰县治安维持会始末》,载《丰县文史资料》第3辑,1985年。

② 何爱吾:《日寇初陷盐城前后的县商会》,《文史资料选辑》(盐城)第3辑,1982年。

江苏部分县镇维持会会长简历表:

姓 名	所在维持会及职务	任维持会会长之前简历	姓 名	所在维持会及职务	任维持会会长之前简历
杨蔚章	无锡维持会会长	素以绅士著称	董际唐	盐城维持会会长	盐城粮业公所会长、公会主席、县商会执行委员
吴利用	江阴维持会会长	曾任苏浙皖区统税局高级职员,因贪污行为被撤职	齐吾身	邳县维持会会长	上海政法大学毕业,先后在镇江、金坛、南通等地任公安局长。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失利,退出政界
沈葆廉	海门维持会第一任会长	曾留学日本,谙熟日语	柳衍斋	镇江维持会第一任会长	北洋时期的旧官僚,在国民政府官场上很不得志
李蔼堂	徐州维持会会长	原为青帮头目,后任铜山县商会会长	沈 炯	常熟自治会会长	曾留学日本
谢鹤龄	六合维持会会长	国民党退休官员,地方头面人物	徐善东	宿迁维持会会长	宿迁县商会商团队长
冯如璋	昆山巴城维持会会长	破落地主	沈务本	溧阳维持会会长	原国民党镇江县长
张若臣	沛县第二任维持会会长	农业大学毕业,其家为沛县四大家之一,家产较多,曾任沛县救济院院长、商会会长和农场场长等职。	岳孟杰	新安镇维持会第一任会长	马恒利油坊经理
施仁心	海门维持会第二任会长	父亲开设恒茂纱布庄,本人毕业于水上警察学校,后在保定军官学校步兵科肄业,曾任通、崇、海、启四县公安队联防区队副兼参谋长,独立 33 师少将旅长	陈则民	苏州自治会会长	日本大学法科毕业,曾任北洋政府大总统顾问、上海各路商会联合会会长、纳税华入理事会会长。1920 年曾创办苏州电器厂并任总办,其夫人为日本人

姓 名	所在维持会及职务	任维持会会长之前简历	姓 名	所在维持会及职务	任维持会会长之前简历
马介三	新安镇维持会第三任会长	安清帮头目	赵凤臣	丰县维持会第二任会长	家境贫寒, 家属靠洗衣裳、做杂活为生
潘玉田	丰县维持会第一任会长	北洋时期的军阀团长, 北伐后, 置田百亩, 在家务农, 是地方上的头面人物	王润之	新安镇维持会第二任会长	安清帮小头目
杜传道	沛县第一任维持会会长	以吃油行为业	郭志诚	镇江维持会第二任会长	大照电气公司经理

资料来源:

《海门县文史资料》第4辑(1985年);《丰县文史资料》第3辑(1985年);《文史资料辑存》(江苏常熟)第2辑(1962年);《镇江文史资料》第9辑(1985年);《沛县文史资料》第3辑(1986年);《文史资料选辑》(江苏盐城)第3辑(1982年);《新沂文史资料》第4辑(1990年);《徐州文史资料》第6辑(1986年);《溧阳文史资料》第4辑(1985年);《昆山文史资料》第7辑(1988年);《江阴文史资料》第7辑(1986年);《苏州文史资料》第3辑(1990年);《宿迁文史资料》第5辑(1985年);《江苏省各县“自治会”概况和工作报告》,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卷号二一〇一~1090《维新政府内政部呈六合维持会会长被杀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卷号二一〇一~307《苏锡常沦陷记》和《镇江沦陷记》, 贺圣遂等编选抗战实录之二——《沦陷痛史》(上),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抗战时期江苏的伪省长》经盛鸿主编《屠杀与抗争》, 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

有留学日本经历的4人, 占18.2%。日本人在侵华过程中, 最需这种人。这不仅是因为这些人谙熟日语, 更重要的是, 他们的留日经历使其具有较强的“恋日情结”, 这种情结促使他们积极主动与日本人的“合作”。以常熟自治会会长沈炯为例。日军占领常熟后, 沈炯就四处活动, 结识了敌警备队小队长山本, 在其介绍下, 沈炯得到日本宣抚班班长的同意, 组织自治会筹备委员会, 然

后又主动派人进城与日本人接洽,终于成立了常熟自治委员会,自任会长。^①当然有此种行为并不囿于有留日经历的人,但以这种人为最。如果说商人、国民政府官员、地方士绅加入维持会还有半推半就、不得已而为之的倾向,那么这部分人已经撕去各种面纱,表现出赤裸裸的通敌行为。

极为有趣的是,在这 22 个维持会会长中,还有 3 个北洋政府的旧官僚,有的还在他们执掌的维持会里恢复北洋时代的制度,沿用五色旗,甚至重着清朝的服饰。^②他们的复出是否暗含着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合法性的否定呢?^③

关于维持会成员的身份,时人亦有精辟的分析。江平指出维持会的成员可分为三种:“一种平时不得志于社会,早有卖国求荣之心而未得机缘,将借机以遂功名富贵之欲者;一种为薄负社会人望,穷途潦倒,既无资迁移,又不能闭门苟活,借此组织名义,聊免冻馁之困者;一种为地方有相当产业,欲借组织力量于维持地方之中,兼可保全自己生命财产者。”^④江平描述的第二种情况多数属于维持会的办事人员,进入维持会有混一口饭吃的倾向。在笔者见到的资料中亦能得到印证。据沛县维持会的厨工回忆:“维持会开饭时,一开就是两三桌,大盆的菜,白面馒头,吃了再添,有的吃了饭就走了。日军为了笼络人心也不追究。”^⑤

① 陆孟英等:《1937 年常熟沦陷记》,载《文史资料辑存》(江苏常熟)第 2 辑,1962 年。

② 闻谅直:《镇江维持会委员长柳衍斋》,载《镇江文史资料》(第 9 辑)1985 年。

③ Timothy Brook 对“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研究表明,“维新政府”多半是“北洋遗老”(《维新政府的成立》,提交 1995 年“中日战争之再评估”研讨会论文,转引自王克文:《欧美学者对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的研究》,载《历史研究》第 5 期,2000 年),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可以推断这些北洋旧官僚确有此种心态。

④ 江平:《扬州的浩劫》,选自《民族大仇记》(汉口,新汉出版社 1938 版),载贺圣遂等编选抗战实录之二(上)《沦陷痛史》。

⑤ 杜水宣:《沛县维持会》,载《沛县文史资料》第 3 辑,1986 年。

参加维持会的人员身份复杂多样,其动机亦各异,但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点,即其上层人物基本上是地方上的头面人物,或者说是有势力、有影响力的人物。换言之,也只有他们具有与日本人“合作”的条件。实际上,日本人每到一地寻求的也正是这些人。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与日本人“合作”的是那些道德、气节都成问题的地痞无赖、投机分子。我们也不能简单化地评价这些人进入维持会是出卖国家、出卖民族,他们有的是为情势所迫,有的想借此发迹,有的是基于维持地方秩序的考虑。

二 维持会的职能及其职员与日本人的关系

大体而言,驻江苏各县镇的日军分为三个部分:战斗部队、宪兵队和宣抚班。宣抚班主要做政治性的工作,负责日军占领某地后恢复社会秩序的任务。维持会便是由宣抚班负责组建、隶属于宣抚班,并在其控制下进行活动的。维持会的结构因地制宜,地方越大越复杂,反之越简单。一般而言,每个维持会至少分设财务科(股)、警务科(股)。^①顾名思义,财务科主要负责供应日本人的军需,警务科则维持地方治安。人员也有多有少,多则10来人(不包括“工役”),少则3人。^②

维持会的职能,就其字面意义理解之,应以维持地方秩序为首要。实际则不然,更多的日本人要求维持会负责供应他们的军需和日常用品。各地维持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是清理市容,收埋尸体;接着协助日军检查过往城门的行人,对出入城门者写写证明等

① 有的地方设有教育科,只不过徒具虚名而已。苏州自治会还设有内务处。

② 苏州自治会号称“九人委员会”,而六合维持会只有3人负责,正副会长各一名,外加一名总务组长。

等^①；有的维持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还修复因战争而遭破坏的桥梁、建筑物等等。但大多数维持会将主要精力放在为日本人采办各种必需品的事宜上。以沛县维持会为例。该维持会“供应日军所需的蔬菜、肉食等副食品以及马草马料等”。但维持会要成功完成这项任务并不易。沛县维持会每天派出三五人到乡间去要东西，其范围也只是城周围五、六里的地方，“再远些，就有被游击队抓去处死的危险”。^②丰县维持会干脆把这项任务交给城关外四个镇的镇长（这四镇也在日伪控制之下）。四个镇长“每天轮值给维持会送面、送柴”。^③有的没有办法，就到附近农村抢掠牲畜家禽，供应日军食用^④。昆山自治会各分会亦“轮流为昆山驻屯皇军代购日用食物，换期轮送”。^⑤

维持会主要为日军提供军需的职能与某些地方头面人物出面组织维持会的初衷不相一致。柳衍斋出面担任镇江自治会会长，“推其用心，自亦抱有救民水火志愿。彼到医政学院难民收容所召集难民演说时，号啕大哭着说，我是为了你们出来”^⑥；潘玉田是在众情难却的情形下出任丰县维持会会长的。潘本人是地方上的头面人物，过去地方政府与外来驻军交涉时，常请其出面接洽。他在担任维持会会长时说：“群众的事，姓潘的只要能干，绝不推辞，可我现在和大家一样在避难，祸从天上来，孩子没成人，将来怎么

① 杜水宣：《沛县维持会》，《沛县文史资料》第3辑，1986年。

② 杜水宣：《沛县维持会》，《沛县文史资料》第3辑，1986年。

③ 杨化民：《日伪时期丰县治安维持会始末》，《丰县文史资料》第3辑，1985年。

④ 曹流：《谈谈汉奸董际唐与盐城维持会和自治会》，《文史资料选辑》（江苏盐城）第3辑。

⑤ “江苏各县自治会概况及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卷号二一〇一～1090。

⑥ 佚名：《镇江沦陷记》。

办?”^①,大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魄。

柳衍斋和潘玉田出任自治会会长和维持会会长主要是从维护地方秩序、保民众平安的角度考虑,试图一方面应付日本人,一方面尽量为市民多做事。但事与愿违,他们上任后,自己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保障,遑论为市民服务了。“柳(衍斋)上任之日,……,举行开会典礼。来宾须经敌兵检查,柳乘包车出外,一人前导,手执日旗,观此种种,已被无形管制,失却自主……”^②;镇江自治会各部“皆有敌人监视,行动无自由余地,请求摆脱固不易,微服出走尤不能……”^③;有的维持会会长还常招致日本人的辱骂、毒打。以沛县维持会会长杜传道为例。时人回忆:杜传道曾对其知己说,他在任会长期间,宪兵队长多次要他找花姑娘,找不到就被打得头破血流,“最初我认为当了会长,他(指宪兵队长)总会高看一眼,遇事有个商量。哪料想同样不当人看待呢!”^④;甚至有的维持会委员的家人亦不能幸免于难而遭到日本人的欺侮,更痛心的是,他们却无力出面保护。“镇江‘自治会’委员尹公甫家妇女被奸,同样不敢申诉于敌军司令;扬州自治会委员吴孝侯,正在开庭审讯抢案,而家人来报,住宅又蒙敌兵光临之讯,吴只得摇首,佯装不知;敌司令入沈铭竹(扬州自治会委员,笔者注)家,坐定,闻复壁中有声,盖其妾匿于其中也,司令问何人,沈诡以甥女对,即牵其手大笑而去”。时人感叹道:“委员自身尚不能保,遑论保护民众!”^⑤

维持会内部中国人的毫无权力以及他们自身利益不断遭到损害,使那些出于维护地方秩序而进入维持会的人渐渐退出,上文提

① 杨化民:《日伪时期丰县治安维持会始末》,《丰县文史资料》第3辑,1985年。

② 佚名:《镇江沦陷记》。

③ 江平:《扬州的浩劫》。

④ 杜水宣:《沛县维持会》,《沛县文史资料》第3辑,1986年。

⑤ 江平:《扬州的浩劫》。

到的柳衍斋和潘玉田做了一个月的会长之后就辞去职务;沛县第二任维持会长张若臣,两个月后也提出辞职,气得日本人把他打得鼻青脸肿,他却乘机逃走;新安镇的第一任会长岳孟杰乃干脆以消极怠工的方式敷衍日本人,二十几天后逃走。^①

这些相对有名望的人退出维持会后,日本人不得不依赖那些浑水摸鱼的人、甚至地痞无赖做事。维持会越来越蜕变为汲取社会资源的工具。一方面为“皇军”搜集物资,另一方面,维持会职员也借日本人的名义以饱私囊。维持会也成为抗日武装打击的对象。以新安镇维持会为例。消极怠工的第一任会长岳孟杰走了之后,不久找来了周成功,干了一个月,日本人不满意,一脚踢开,他们又找了个安清帮的小头头王润之做第二任会长。王润之在安清帮里小有名气,没有文化,平时不务正业,担任维持会会长之后,没能替日本人做出成绩,四、五个月后被撤职。接着安清帮的大头头马介三在其徒弟们的推荐下出任新安镇第三任维持会会长。他平时不但结交上层人物,还结交了不少中下层人物,并与闯江湖的人来往。他当上了维持会长后,社会上一些流氓匪徒走了他的门道,担任了伪职。他的手下依仗日本人的势力,敲诈勒索,鱼肉百姓,经常夜里率部四出抢劫,杀人放火,无所不为。有一次,新安镇维持会十来人来到附近的唐店骚扰,被抗日军民杀死。^②

新安镇维持会的发展变化不是孤例。镇江自治会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最近自治会组织日益扩大,品类庞杂,奸人趋就,如蚁附膻,做出种种把持侵吞鱼肉敲诈之事,劣迹多端,吾民更苦”。^③

日本人要求维持会成为其汲取社会资源的工具,而出面组织

① 张邵连:《沦陷期间的新安镇》,《新沂文史资料》第 4 辑,1990 年。

② 张邵连:《沦陷期间的新安镇》,《新沂文史资料》第 4 辑,1990 年。

③ 佚名:《镇江沦陷记》。

维持会的中国人却主要出于维持地方秩序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目标的不一致性,导致维持会中的中国人与日本人存在着冲突。中国人在这场冲突中显然处于弱势地位,甚至连维持会委员也不能保全其自身的利益。部分维持会会长或职员开始厌倦这种傀儡的地位而退出其中。填补他们位置的是地方上品德稍欠之人、间或地痞流氓。他们出掌维持会不但不能维持地方秩序,相反却助长地方的混乱。维持会内部的冲突进一步发展为维持会与中国人的对立,维持会成员亦成为抗日军民镇压的目标。

关于维持会或伪政权尤其是基层政权里的中国人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史学界的薄弱环节,间或有研究也仅仅停留在道德审判层面。这些人统统被斥为“汉奸”,骂他们利欲熏心、没有民族气节,勾结日本人鱼肉乡民。然而实际的历史画面远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得多。本文通过江苏各县镇的维持会研究发现,与日本人“合作”的中国人动机复杂,某些人是出于自保或安境保民而进入维持会;另外一些人是不得已而与日本人“合作”;当然也有一些浑水摸鱼之人,试图借日本人的势力渔利;确实也有一些人死心塌地替日本人做事;等等,不一而足。正因为参与其中之人的动机复杂,才使维持会中的中国人与日本人矛盾迭起。中国人显然的弱势地位迫使一些人只能采取退避的方式消极抵抗。一些地方的维持会几经易人,其资源汲取能力越来越强,而维持秩序的职能却越来越弱,甚至成为社会的乱源。伪政权自上而下的普遍腐败在维持会期间已初见端倪。

(作者潘敏,1975年生,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生)

(责任编辑:刘兵)